

後共產黨時代的艱難旅程

• 馬 什
(Christopher Marsh)

當中國在80年代初成立經濟特區，建起了市場經濟的孵化器時，蘇聯才剛剛開始走出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領導下出現的停滯期。關鍵步驟始於戈爾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 在1985年登上蘇共總書記的寶座。契爾年科 (Konstantin Chernenko) 的去世使這一職位空出，戈爾巴喬夫去參加任命他為總書記的會議之前，對妻子說：「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①戈爾巴喬夫掌握了黨的領導權後，很快便着手進行改革創新，它將從根本上改變蘇聯社會的基礎，甚至將動搖蘇聯的生存。戈爾巴喬夫並不想把蘇聯置於死地，他只想給衰朽的蘇聯注入新的活力。然而，他為完成這項任務而釋放出來的力量，卻最終導致這個體制的壽終正寢。

戈爾巴喬夫並不想把蘇聯置於死地，他只想給衰朽的蘇聯注入新的活力。然而，他為完成這項任務而釋放出來的力量，卻最終導致這個體制的壽終正寢。整個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在後共產黨時代的發展，要比大多數人設想的更加艱難、更加漫長。俄羅斯的十年改革，成功與挫折不相上下，市場化和民主化改革的進展緩慢而曲折。

整個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在後共產黨時代的發展，要比大多數人設想的更加艱難、更加漫長。俄羅斯的十年改革，成功與挫折不相上下，市場化和民主化改革的進展緩慢而曲折。人們長期夢寐以求的自由，在變革 (perestroika)、公開性 (glasnost) 和民主化 (demokratizatsiya) 如火如荼的日子裏，似乎已經觸手可及，但是，俄羅斯的政體能否維持這種自由，要得出結論仍然為時尚早^②。本文將集中分析蘇聯解體以後，後共產黨時代的經濟和政治發展過程。

一 史無前例的改革

為了把這種分析放在一個歷史的和比較的背景中，我要首先簡短比較一下蘇共和中共的改革，兼顧它們的異同。

蘇共和中共的改革有少數相似之處，尤其是在一個基本願望方面，即放棄存在於這兩個社會中的傳統蘇聯模式。然而，實際推行的改革，在大多數方面都不一樣。例如，發動和推行改革的背景就十分不同。中國在她的第一位共產黨領袖去世後，幾乎立刻就開始了改革，發動和實施改革的人，包括鄧小平在內的許多領導人，是實際參與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統治的。蘇聯的情況則完全不

同，做出改革努力的領導人及其支持者，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都還未出生。事實上，他們的成年期正值赫魯曉夫 (Nikita Khrushchev) 對斯大林模式進行重新評價，並且放鬆了嚴格的社會管制。中國着手於體制改革，是發生在發展的較早階段，領導人擁有更大的合法性，當然這也構成了某些限制。例如，許多改革者實際參與過共產制度的建立，這意味着他們不太願意放棄這種制度中一些同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因素。

蘇聯和中國的改革，也有着十分不同的意識形態基礎。鄧小平及其同僚試圖改善國家的經濟狀況，但他們是用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來表述的，這清楚表明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雖然得到「重新評價」，但未必會被放棄。中國的領導層擔心意識形態上改弦更張，將鼓勵人民「懷疑一切」，質疑黨的領導地位^③。相反，在蘇聯大家都很清楚，戈爾巴喬夫正在馬不停蹄地放棄許多社會主義教條，不太考慮或根本不考慮這可能給一直受馬列主義思想灌輸的人民所造成的影響。自由化和經濟發展都明確地以西方為楷模，清楚表達着與馬列主義戒律決裂的意向。

在推行改革的速度上也有類似的差別。中國用了多年時間引入市場化改革，即使在二十多年以後，經濟仍未完全擺脫國家的控制，而蘇聯的經濟在三兩年時間內，便從允許私人經濟活動轉向推行世界上最龐大的私有化計劃。兩個國家對改革的態度也十分不同，在中國，改革不但受到歡迎，而且獲得了地方和基層群眾的主動協助。改革在蘇聯得到的回應則較為冷淡，並受到官僚阻撓。

不過，蘇聯和中國改革共產制度的努力所帶來的結果，也有相似之處。兩個國家的改革都發揮着促進中產階級的發展、導致意識形態陣營分化的作用，比如出現了改革派、中間派和保守派。然而，最有意義的事情是兩國公民社會的同步興起。80年代末，中國的公民社會端倪初現，1989年4月到6月間的示威活動是其最清晰有力的表現。在蘇聯，人民幾乎一夜之間便獲得了更大的自由，中間階層和精英的相對強大，使這裏的公民社會的發展和組織十分迅速。再加上國家特有的多種族特點，以及她在東歐的多民族帝國，意味着對民族主權與獨立的強烈要求會導致大規模的危機。最終導致蘇聯崩潰的過程固然不是由公民社會所發動，但推翻蘇聯的卻是按政治和種族路線組織起來的公民團體。

中蘇兩個體系也都因為各自的改革而陷入危機。中國在1989年面對相當廣泛的危機，雖然最終仍得到了成功的控制。蘇聯在1989-1991年的危機要比中國面對的更嚴重，甚至是致命的。正是在這方面，中國與蘇聯的改革形成了最鮮明的對照：中國經受了跌宕起伏的考驗，但她畢竟學會了緩慢調整；蘇聯卻迅速踏上走進「歷史垃圾箱」的道路，成為對馬克思預言的反諷。

蘇聯和中國改革共產制度的相似之處，最有意義的是兩國公民社會的同步興起。1989年4-6月間的示威活動是中國公民社會最清晰有力的表現。在蘇聯，人民幾乎一夜之間便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公民社會的發展和組織十分迅速。中國經受了跌宕起伏的考驗，學會了緩慢調整；蘇聯卻迅速踏上走進「歷史垃圾箱」的道路，成為對馬克思預言的反諷。

二 後共產黨時代的艱難旅程

自從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後，俄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改革方面，都取得了可觀的進步。一共進行了四次議會選舉、一系列區域和地方選舉以及三次總

統選舉。俄國的領導層也由此發生了重大變化，普京 (Vladimir Putin) 從葉利欽 (Boris Yeltsin) 手裏接過總統寶座，統一俄羅斯黨取替共產黨成為主要的議會勢力。俄國經濟在90年代的最初幾年雖然持續衰退，但也經歷了實質性的結構調整，在新千年到來之際，經濟復蘇為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帶來了希望。

當然，俄國也面臨嚴重的困境與挑戰。當俄國踏上後共時代的旅程時，立刻就要應付若干異常艱巨的任務：把老朽的指令式經濟轉變為穩定而有效率的自由市場體系；維護領土完整；在一個有着漫長專制統治歷史的國家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從1993年秋天人民代表大會與葉利欽政府之間的流血對抗，到車臣的十年戰爭，包括莫斯科的劇院、地鐵和體育場受到的恐怖襲擊，國家眾多的失敗事例隨處可見。不過大體上說，在過去十年裏，俄國在鞏固民主治理、發展市場經濟和加強初生的公民社會方面，可謂成績斐然。

俄國踏上後共時代，立刻就要應付若干異常艱巨的任務：把老朽的指令式經濟轉變為穩定而有效率的自由市場體系；維護領土完整；在一個有着漫長專制統治歷史的國家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過去十年俄國在鞏固民主治理、發展市場經濟和加強初生的公民社會方面，可謂成績斐然。在新千年到來之際，經濟復蘇為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帶來了希望。

(一) 走出歷史的陰影

其實，在蘇聯解體之後，俄國並不具備輕裝上陣、「從零開始建立民主」的優勢^④。相反，公民和政治活動家必須對付這樣一種從未以民主方式運作過的體制，它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只發生了局部變化。甫獲獨立的俄國，仍然受着蘇聯時代的憲法和法典、更不用說民風民俗的支配。所以，就90年代初期俄國政治體系的發展而言，不應把它視為從零開始的民主發展，而應視為從蘇聯崩潰的陰影中逐漸走出的過程。

蘇聯制度的第一項遺產，是行政和立法部門的權力劃分不明確。葉利欽擔任總統後，他的副手哈斯布拉托夫 (Ruslan Khasbulatov) 接替他的位置，成了立法部門的發言人，兩人之間不久便出現了嫌隙，隨後演變為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間的一場較量。哈斯布拉托夫反對葉利欽及其代總理蓋達爾 (Yegor Gaidar) 提出的激進經濟改革，他利用自己在立法部門的地位杯葛改革法案，在1992年12月拒絕重新任命蓋達爾擔任總理。

1993年3月，最高蘇維埃對葉利欽這位在1991年6月選舉中上台的總統啟動了彈劾程序，但是被1993年4月25日的全民公決挫敗。此次全民公決要求人民回答的問題是：他們是否支持葉利欽政府，是否贊成提前選舉。有53%的微弱多數贊成葉利欽的經濟政策，59%的人對他擔任總統表示信任，但是對於提前選舉總統的問題，選民大體上是一分為二。葉利欽把這一結果視為重新得到了人民的授權，便着手準備新憲法以鞏固自己的權力。1993年9月21日他下令解散議會，舉行新的議會選舉。哈斯布拉托夫在副總統魯茨科伊 (Aleksandr Rutskoi) 的支持下，拒絕接受葉利欽的制憲動議，並在白宮 (議會大廈) 周圍設置路障。魯茨科伊宣布自己為代總統。有兩周的時間，群眾一直包圍着設有路障的白宮。軍隊在10月4日採取武裝行動攻打白宮，魯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及其支持者很快束手就擒。

葉利欽利用這次「十月事件」推動改革，用更加明確的職能和權力劃分調整了政治體系，並為全國和地方選舉以及新憲法的全民公決做準備。憲法規定了一個兩院制的立法機構，賦予總統巨大的權力。俄國人民雖然有機會在憲法全

民公決中對新憲法表達意見，但其實他們沒有真正的選擇，只能對交給他們的憲法表示贊成或反對。反對意味着繼續生活在舊憲法的框子裏，贊成則意味着認可強大的總統權力。1993年12月12日的憲法全民公決和選舉給了俄國一部新憲法，也為這個國家帶來了一個嚴重分化的立法機關。沒有哪個政黨得票超過四分之一。最明顯的贏家是日里諾夫斯基 (Vladimir Zhirinovksy) 的具民族主義傾向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它獲得了22%的選票，蓋達爾的「俄羅斯選擇」得票率只有15%，受到壓制的共產黨得票12%。

羽翼未豐的俄國民主，在1995年12月議會選舉中經受了第一次考驗。競選活動未受阻撓的共產黨成了大贏家，獲得22%的選票，日里諾夫斯基的自由民主黨獲得12%，親政府的「我們的家園俄羅斯」獲得10%。一位俄國政治學家評論道^⑥：

最令觀察家吃驚的是，儘管四年來無休止的反共宣傳，在俄國再次佔了上風的，仍是民眾的社會主義信念、國家統一和蘇維埃大國的復辟。這種信念至少獲得了三成選民的支持，他們把票投給了共產黨以及在意識形態上與它接近的政黨。

儘管原共產黨政權的種種錯謬和失敗，儘管新政權的反共立場和宣傳，人民仍然堅持社會主義信念，存在着普遍的懷舊情緒。這種現象其實不難理解，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期，人們會情不自禁懷念過去的時光，那時儘管自由無多，但蘇維埃國家至少為人民提供了一種差強人意的生活。

從1996年的總統選舉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在第一輪選舉中，葉利欽險些輸給共產黨領導人久加諾夫 (Gennady Zyuganov)，他拿到了32%的選票，葉利欽得票為35%。葉利欽很清楚共產黨獲得支持的性質，他在第一輪選舉後宣稱：「我知道，大家並不是投票支持我們過去的生活，而是投票反對今天的苦日子。」^⑦在決勝局的選舉中，當只能在葉利欽和久加諾夫之間做出選擇時，俄國的多數選民把票投給了葉利欽。他再次獲得授權。

(二) 走向普京時代

1996年的總統選舉使葉利欽能夠再幹四年，但是1993年的憲法規定了任期兩屆的限制，這意味着第二屆任期也是最後一屆任期。葉利欽的威權主義傾向曾讓一些人相信，他有意取消原定於2000年6月舉行的總統選舉。然而，當葉利欽的第二屆總統任期就要結束之際，他卻公開表示，他希望「作為確保〔俄國〕第一次合法權力轉移的總統載入史冊」^⑧。就在2000年的鐘聲敲響前幾個小時，他把總統職位讓給了當時的總理普京，許多人認為，葉利欽是想要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為他這位門生壯大聲勢。這話固然不錯，可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實。這次權力轉移是一份談判協議的一部分，它規定了不得追究葉利欽在任職期間的罪行和「違規行為」。

儘管原共產黨政權的種種錯謬和失敗，儘管新政權的反共立場和宣傳，俄國人民仍然堅持社會主義信念，存在着普遍的懷舊情緒。在1995年12月議會選舉中，共產黨成了大贏家。1996年的總統選舉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葉利欽很清楚共產黨獲得支持的性質，他說：「我知道，大家並不是投票支持我們過去的生活，而是投票反對今天的苦日子。」

1999年12月杜馬選舉的結果向葉利欽清楚表明，這是他選擇繼承人參加大選的大好時機。在這次選舉中，一個親克里姆林宮的政黨所獲得的支持，在後蘇聯時代第一次與共產黨持平。俄共的得票依然最多，為24%；親普京的聯盟以23%的得票稍稍落後。另一些中央派政黨，如右翼力量聯盟(8.5%)和「祖國—全俄羅斯」聯盟(13%)，也獲得了相當可觀的支持。在車臣重開戰端沒有丟失多少民意，普京的民望也達到了創記錄的高峰，他穩操勝券。

普京，這位前克格勃官員和聖彼得堡市副市長，在短暫的選戰中把這些優勢發揮到了極致，電視報導也給他幫了大忙。在3月26日的第一輪選舉中，普京便以53%的得票率勝出，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只獲得了30%的選票。

2000年5月，普京就職俄國第二位總統，標誌着這個國家第一次符合憲法的總統權力更迭。就此而言，普京的當選證明了俄國是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內，遵照憲法規定的程序運行。不過也暴露出一些選舉舞弊現象，包括焚燒選民登記證、威脅選民、偽造選民表格等等^⑥。普京確實享有廣泛的民意支持，因此這些做法全無必要，或許只是為了保證他的得票超過50%，避免參與兩位得票最多候選人的第二輪對決。

普京甫一上台，俄國的民主似乎立刻受到了打擊。普京的第一道指令，是重申中央對廣袤的國家領土和政治經濟利益集團的控制權。葉利欽傾向於分散克里姆林宮的權力，只要它沒有直接威脅到他本人的地位。糾正這種傾向也許是必要的，但普京在重申莫斯科的權力時採取的方式，卻使西方觀察家、外國政府和俄國自由派對他作為民主派的聲譽產生懷疑。普京逮捕或放逐了一些寡頭，關閉了他們擁有的獨立媒體，這些措施讓一部分人坐臥不安。他們把這視為反民主的措施，而不是為了抑制某些私人集團的權勢；這些集團通過犯罪和腐敗建立起自己的經濟帝國，勢力之大足以抗衡克里姆林宮。不過，在打擊犯罪、使俄國公民恢復秩序感甚至榮譽感方面，普京的措施十分成功。過去，俄國公民總是把後共時代的政府同葉利欽的醉漢形象和病態身軀聯繫在一起，而普京與他形成鮮明對照：一個柔道好手和克格勃老兵，象徵着力量與驕傲。

俄國在普京的領導下取得了多大進展，可以從2003年至2004年的議會和總統選舉中看出。在2003年12月的杜馬選舉中，一個親克里姆林宮的政黨第一次成了後蘇聯時代的真正贏家：統一俄羅斯黨獲得了37%的選票，以12個百分點大大領先第二位的共產黨。在2004年3月的總統大選中，普京實際上沒有對手，共產黨和自由民主黨的領袖都拒絕參與競選，兩黨僅分別推出了不太知名的政治家哈里托諾夫(Nikolai Kharitonov)和馬雷什金(Oleg Malyshev)，一個是前集體農莊主席，另一個是前拳擊選手。除了這兩人之外，還有杜馬成員格拉濟耶夫(Sergei Glazyev)和米羅諾夫(Sergei Mironov)，他們雖然有些議會政治家的聲望，卻肯定不是任何有組織的政治運動的成員。自由派的哈卡瑪塔(Irina Khakamada)失去其政黨的支持後，以獨立身份參加競選。看看這種狀況便不會奇怪，普京為何能以71%的得票再次當選。真正的問題是，這次選舉對俄國的民主意味着甚麼？

普京甫一上台，俄國的民主似乎立刻受到了打擊。普京的第一道指令，是重申中央對國家領土和政治經濟利益集團的控制權。普京逮捕或放逐了一些寡頭，關閉了他們擁有的獨立媒體，一部分人把這視為反民主的措施。不過，在打擊犯罪、使俄國公民恢復秩序感甚至榮譽感方面，普京的措施十分成功。

普京在競選中實際上沒有對手，這固然是個事實，卻不應據此認為俄國的民主已經壽終正寢。俄國人都十分清楚，反對普京的人沒有任何機會，自1999年以來，他一直是俄國最受歡迎的領袖。2004年大選前夕的民意調查顯示，普京享有72%的支持率，無人可以望其項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普京必須在2008年第二屆任期屆滿時退下（在不修改憲法的前提下），那麼與其徒勞無功地浪費資源，還不如退出競選。對俄國民主的真正考驗將發生在2008年，屆時普京如果拒絕退位，他的威權主義傾向就將暴露無遺；如果一個新的領袖進入克里姆林宮，俄國的民主化進程將變得不可逆轉。

（三）後共產黨時代的經濟改革

與國家的政治改革相反，俄國後共產黨時代的經濟改造不但在蘇聯解體後立刻啟動，並且此後一直勢頭不減。1992年1月2日開始實施的經濟改革方案，要求同時對所有重要的經濟領域迅速實行改革。遵照「休克療法」的方案，除少數消費品和能源產品外，價格管制被一概取消，大力推行私有化，採取了使盧布可對換的措施。政府大幅提高徵稅、削減開支，力爭做到收支平衡，並且最終放棄了中央計劃，讓市場調節供需。

有人以為，只要為自由市場經濟奠定基礎，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就會造就一個既有效率又穩定的經濟。這種看法與事實相去千里。改革方案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儲蓄迅速萎縮，產量銳減，造成生活質量的全面惡化。事實上，有些後果是災難性的，葉利欽的副總統魯茨科伊把它形容為「經濟種族滅絕」^⑨。1992年出現了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嚴重的GDP衰退，幾乎比1991年下降20%，1993年又比1992進一步下降12%，整個90年代始終貫穿着這種實質性的衰退^⑩。

經濟改革方案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國有資產的私有化，由國有資產管理全國委員會的首腦丘拜斯（Anatoly Chubais）設計和領導。俄國的這一場把所有權從國家轉移給私人的經濟變革，被稱為「世界上最具雄心、最迅速的國企私有化方案」^⑪。不過，也可以把它稱為一次「火災殘留物拍賣會」，因為絕大多數企業の出售都遠低於市場價。從1992-1999年，有超過140,000家企業實行了私有化，其中包括25,000家有數千名工人的大型企業^⑫。私有化過程在清除國有資產上十分成功，大約有四千萬俄國人成了私有企業的股東（超過世界上的任何國家）^⑬，不過這個過程遠遠談不上公正，它造成了共產體制轉型中的「贏家」和「輸家」^⑭。

從1992-1994年的私有化第一個階段，每個俄國公民都獲得了票面價值為一萬盧布（按1992年的匯率折合十美元）的「私有化證券」，用於向他們所選擇的公司進行投資。人們的設想是，俄國的這些新的股份持有人，將投資於私有化公司或他們自己工作的企業。由於這個時期快速的通貨膨脹、經濟混亂和整體性的經濟困境，大多數俄國人沒有選擇進行長期投資，而是以大打折扣的價格把他們的私有化證券賣給了投機商。這些投機商能夠以極低的價格獲到企業的控股權。此外，這些投機商往往就是企業的前任經理，這意味着私有化成為精英

經濟改革方案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國有資產私有化，這場把所有權從國家轉移給私人的經濟變革，被稱為「世界上最具雄心、最迅速的國企私有化方案」。不過，也可以稱它為一次「火災殘留物拍賣會」，因為絕大多數企業の出售都遠低於市場價。大約有四千萬俄國人成了私有企業的股東，不過這個過程遠遠談不上公正，它造成了共產體制轉型中的「贏家」和「輸家」。

們把自己在蘇聯體制下獲得的私有財產合法化的手段。這個過程把國有資產迅速轉移給了私人，但是私有化並沒有帶來任何經濟收益，因為既沒有真正的資本投入，組織和管理結構也未發生重大變化^⑭。

私有化的第二個階段於1994年夏天宣布，翌年啟動。在這個「現金」階段，只按市場價格進行私有化，方式是拍賣和投資方出標。出售企業的收入51%歸企業，其餘部分在聯邦和地方政府之間分配^⑮。1992-1994年以私有化證券實行私有化的階段，從本質上說是要消滅國有資產。與這個階段相反，私有化的現金階段才是俄國真正市場轉型的開始。投資者選擇那些真正有前景的公司進行投資，企業一旦完成私有化，管理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整個企業脫胎換骨。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只是經濟改制畫面的局部，因為單純的私有化並不能保證經濟績效的改善。有研究表明，由經理和外國投資者控制的私有化企業，要比由工人控制的企業表現更佳。這也許是經理和外國投資者最初購買股份的企業，「都有較好的業績和改制前景」，而那些贏利能力較差的企業則被留給了工人^⑯。

對於提高俄國經濟部門的產量和效率來說，私有化可能是最具根本性的變革，但另一些因素也同樣重要，這包括創建新的企業和發展市場貿易。截至1998年7月，俄國大約有87.5萬家小企業。後共產黨時代創立的小企業超過一百萬家，不過其中許多是創立於私有化的早期階段，很快便關門大吉。同樣，以市場為基礎的貿易的發展，也比許多人設想的更為困難。休克療法的結果是，必須在一夜之間建立市場以取代中央計劃。當市場未能真正出現時，人們便求助於實物交易、在個人菜地裏種糧食，甚至乾脆甚麼也不幹（姑不論偷盜和犯罪）。

儘管這項任務艱巨無比，障礙重重，俄國經濟還是在1998年終於有了起色，出現了脫困的跡象。但是，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俄國經濟在1998年8月再次跌入低谷。過去幾年裏，經濟一直在緩慢復蘇，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普京政府實行的結構改革。如今，俄國經濟已經取得穩定，正在經歷着可觀的增長。總之，俄國已經成功完成了世界上最艱巨的經濟轉型的第一階段，正如一家西方投資機構最近所說：「俄國國內產業的競爭力已經有所改善，取得了宏觀經濟的穩定，基本的市場環境已經形成。」^⑰

(四) 公民社會和自由

民主和自由在俄國的命運，不僅取決於維護自由選舉和建立有效的市場經濟，俄國也需要一個關心公益、能夠發揮政治作用的活躍的公民社會。只有積極的公民共同形成一個公民社會，才能對國家權力形成有效的制約；國家權力在普京的領導下已經成倍增長。在培育公民社會方面，俄國面臨着巨大的障礙，其中至少包括對共產黨歷史和過去大國地位的懷念。不過，也有學者對今天俄國公民社會的成長持樂觀態度。例如，赫德森 (George E. Hudson) 認為公民社會正在俄國發展，並對公民團體成為俄國政治生活中一個突出角色表示了「審慎的

俄國經濟在1998年終於有了起色，但是，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俄國經濟再次跌入低谷。過去幾年裏，經濟一直在緩慢復蘇，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普京政府實行的結構改革。如今，俄國已經成功完成了世界上最艱巨的經濟轉型的第一階段，「俄國國內產業的競爭力已經有所改善，取得了宏觀經濟的穩定，基本的市場環境已經形成。」

樂觀」¹⁹。吉布森 (James L. Gibson) 根據對俄國社會網絡和公民社會的調查數據的分析，也認為俄國的社會網絡和公民意識正在促進國家的民主轉型²⁰。

除了公民組織以外，教會和宗教生活也是公民社會的重要機構，它們為公民的參與提供了方便。有研究指出，經常去東正教教堂的俄國人，也更有可能通過投票之類的活動參與公民和政治生活²¹。俄國既有上千年的基督教傳統，又有近七十年的無神論經歷，這種特殊的歷史，使教會成為衡量俄國的公民生活和宗教參與的一個不可多得的晴雨表。作為「強迫世俗化」政策的一部分，教會曾在蘇聯受到系統的打壓；大多數教堂在共產黨時代要麼被毀，要麼成了國家財產。從1989-1999年，宗教信徒一直在努力恢復或重建他們的舊教區；在這個時期，俄國的東正教教堂從大約7,500座增加到了19,000座²²。

缺少自由，大概是蘇聯最令人憎惡的特徵。獲得自由不但是持不同政見者的夢想，也是普通人和政治改革家的夢想。在「改革」、「公開性」和「民主化」如火如荼的日子裏，自由似乎已經到了俄國公民手裏，可是在蘇聯解體十幾年後，他們仍然要為爭取和維護自由而鬥爭。俄國公民雖然比二十年前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建立自治的公民領域，使自由得到可靠的保障，仍是未來一項艱巨的任務。

自蘇聯解體以來，宗教領域大概是公共生活中最具競爭性的領域。教會是最早受益於改革的社會組織。戈爾巴喬夫在1988年承認了教會是合法的公共機構，此後宗教便開始在俄國復興。這種新的局面，很快便通過1990年的「良心自由與宗教信仰」法的出台而受到法律保護，這部法律在俄國歷史上第一次落實了宗教平等，其中一個或許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傳教活動和改宗現象迅速增加²³。隨着西方的宗教組織開始在俄國開展活動，新的宗教運動也開始湧現，它們受到政府官員和俄國東正教教會的抵制，因為它們威脅到東正教，甚至威脅到俄國的民族認同²⁴。1997年，新的「良心自由與宗教社團」法對宗教「組織」和宗教「結社」做了區分，前者是指至少在俄國存在了十五年的機構，後者的財產權、教育、出版和傳教活動則受到限制。剝奪宗教自由的現象在俄國並未徹底消失。俄國政府則繼續同東正教培養親密關係，東正教實際上承擔起了國家教會的角色，雖然沒有正式的名份。

除了宗教自由，另一些自由也是開放社會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大概是出版自由。在蘇聯時代，媒體不可能履行監督政府的職能，因為它們直接受到國家控制，只被用來向人民傳達消息和進行政治宣傳。在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政策下，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允許媒體公布過去保密的事件，甚至可以抨擊政府。水閘終於打開，出現了獨立的報紙、電視台和電台。在葉利欽統治下，媒體的報導和批評能力大為提高，雖然許多媒體集團陷入財務困難，其批評也近似於「黃色新聞」，即通過傳播醜聞吸引讀者，或是為了從成為揭露對象的政治和商業對手那兒換取現金。它們也不再像以前那樣自由了，因為它們受到一小撮以「寡頭」聞名的商業大亨的控制，這些人在脫離共產體制的轉型期間聚斂到巨額資金。儘管這些大亨形象十分負面，葉利欽卻發現和他們有着共同

缺少自由，大概是蘇聯最令人憎惡的特徵。可是蘇聯解體十幾年後，俄國公民雖然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建立自治的公民領域，使自由得到可靠保障，仍是一項艱巨任務。教會是最早受益於改革的社會組織。但隨着西方宗教組織和新的宗教運動在俄國湧現，它們受到政府和東正教教會的抵制，因為東正教實際上承擔起了國家教會的角色。

的立場，因為雙方的心腹大患是一樣的——共產黨重新掌權。職是之故，這些寡頭及其媒體帝國也支持葉利欽贏得大選。

媒體在普京的競選活動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普京一上台就對媒體和控制媒體的寡頭發起進攻，從而限制了媒體的力量。古辛斯基 (Vladimir Gusinsky) 及其媒體帝國大張旗鼓地公開反對普京政權，不久便被摧垮；2002年1月，俄國最後一家獨立的全國性電視頻道「電視六台」也被關閉，這進一步減少了該國獨立媒體的聲音。

普京到底目的何在，不易分辨。是針對獨立媒體，還是針對操控媒體的寡頭？雖然西方極力反對自由媒體在俄國受到的打壓，俄國人自己卻好像不太在意。2000年3月，有55%接受調查的俄國人說，他們期待並希望普京加強國家對媒體的控制^⑤。至於關閉「電視六台」，只有7%的俄國人認為普京與此事大有關係，反而有很多人認為，這不過是「經濟活動家」的內訌而已^⑥。

博夫特 (Georgy Bovt) 總結這種形勢說：「顯然，當代俄國公民社會的媒體，仍不能做到準確傳達全社會的關切，或以任何果敢的方式捍衛民主和自由市場改革。」^⑦媒體自由在俄國的衰落，肯定有礙於公民社會的力量，抑制俄國人民實行自治、監督國家、限制其對社會為所欲為的能力。

(五) 蘇聯歷史和俄國的未來

俄國向民主和自由市場的轉型，肯定與蘇聯的過去聯繫在一起。前進意味着走出這段歷史，但它仍然活在今天的俄國，大大影響着人們——無論是被統治者還是統治者——看待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的方式。在90年代，這共產體制的遺產一直是俄國歷史中最重要內容，塑造着她走向後共時代的道路。俄共在1995年12月的杜馬選舉中展示出強大的力量，久加諾夫在1996年夏天差一點打敗葉利欽，都十分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共產黨在1999年杜馬選舉中的得票，再次超過任何單一政黨，這項成績進一步驗證了共產黨支持者的恢復能力。只是在2003年12月的杜馬選舉中，一個親克里姆林宮的政黨才成為後蘇聯時代俄國的真正贏家。

不言而喻，蘇聯歷史在這個國家的許多方面都有反映，而不僅表現在共產黨獲得的支持上。大概更重要的是，大多數俄國人對共黨統治的終結感到遺憾。1999年的民調數據顯示，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只有近22%的俄國人會選擇現在的生活，卻有差不多64%的俄國人會選擇他們在1991年以前的生活。當明確問到他們對蘇聯崩潰的感受時，有77%的人說，他們為此感到惋惜^⑧。

在新千年時代，共產懷舊病和俄國共產黨都有可能日益變得無關緊要，然而這並非因為它們的象徵符號已經失去民心。倒不如說，另一些人已經更有效地接過了蘇聯過去的影響力，用多少有些不同的形式復活了它。從普京本人以降，包括總統行政班子中的許多成員和杜馬成員，甚至地區長官、安全部門、軍隊和警察，在讓自己同那個政權的罪惡保持距離的同時，也開始向俄國公民

在90年代，共產體制的遺產一直是俄國歷史中最重要內容，塑造着她走向後共時代的道路。大多數俄國人對共黨統治的終結感到遺憾。在新千年時代，共產懷舊病和俄國共產黨都有可能日益變得無關緊要，因為一些人已經更有效地接過了蘇聯過去的影響力，用多少有些不同的形式復活了它。從普京本人以降，在讓自己同那個政權的罪惡保持距離的同時，也開始向俄國公民表明他們代表着蘇聯最好的一面。

表明他們代表着蘇聯最好的一面。這些新的「中央集權派」用俄羅斯帝國的許多象徵符號來裝點自己，自豪地談論着國家的過去，對她的未來表現出樂觀精神。對於一個被經濟困境、街頭暴力和無處不在的腐敗所困擾的社會來說，他們傳遞的信息是很有感召力的。這個新階級實際上是改頭換面的蘇聯精英，這進一步證實了有關老精英在後共產黨歐洲的生存和轉型能力的論點^⑨。

三 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俄羅斯

戈爾巴喬夫本想拯救蘇聯，他的改革卻導致了蘇聯的覆滅。後共產黨時代表明，制度的變革並不能保證平穩的發展。在蘇聯解體已經十幾年後，俄國仍未取得改革者所嚮往的民主治理和經濟繁榮。其實，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在後共時代的發展，與任何人的設想相比，都是一個更困難、更漫長的過程。今天的俄國仍然要克服過去的創傷，仍要克服建立民主和自由市場這一雙重任務中的難題。許多領域的成就顯而易見，包括市場經濟和日益制度化的政治體系。但是，贏得民主、自由和經濟繁榮，仍然是一項有待完成的艱巨工作。不消說，就俄國的未來而言，得出任何最終結論仍然為時過早。不過，她同過去一些令人憎惡的因素的決裂，似乎已經完成。

馮克利 譯

註釋

- ① Mikhail Gorbachev, *Zhizn'i Reform*, vol. 1 (Moscow: Novosti, 1995), 265.
- ② Christopher Marsh and Paul Froese, "The State of Freedom in Russia: A Regional Analysis of Freedom of Religion, Media and Markets",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32, no. 2 (June 2004): 137-49.
- ③ Yan Sun, *The Chinese Reassessment of Socialism, 1976-199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29.
- ④ M. Steven Fish, *Democracy from Scratch: Opposition and Regime in the New Russ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⑤ Boris Slavin, "The Ideas that the People Went For", *Pravda*, 23 December 1995, 1.
- ⑥ "The New Life is More to be Cherished than Grievances", *Rossiskaya Gazeta*, 28 June 1996, 3.
- ⑦ ITAR-TASS (8 June 1999).
- ⑧ Yevgenia Borisova, "Baby Boom or Dead Souls", *Moscow Times*, 9 September 2000.
- ⑨ Celestine Bohlen, "Yeltsin Deputy calls Reforms 'Economic Genocide'", *New York Times*, 9 February 1992.
- ⑩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Guide fo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6), 40-41.

- ① Darrell Slider, "Privatization in Russia's Regions", *Post-Soviet Affairs* 10 (1994): 4, 367-96.
- ⑫⑬⑭ Victor Supyan,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Some Preliminary Results and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Demokratizatsiya* 9, no. 1 (2001): 137-54; 146; 148.
- ⑮ J. Blasi, M. Kroumova, and D. Kruse, *Kremlin Capitalism: Privatizing the Russian Econom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⑯⑰ Sergei Aukutsionek, Igor Filatochev, Rostislav Kapelyushnikov, and Vladimir Zhukov, "Dominant Shareholders, Restructuring and Performance of Privatized Companies in Russia: An Analysis and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Communist Economies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10, no. 4 (1998): 495-518; 511-12.
- ⑱ Ernst & Young International, Ltd., *Doing Busines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Ernst and Young, 2002), 5.
- ⑲ George E. Hudson,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Models an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Russian Review* 62, no. 2 (2003): 212-22.
- ⑳ James L. Gibson, "Social Networks, Civil Society, and the Prospects for Consolidating Russi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 no. 1 (2001): 51-69.
- ㉑ Stephen White and Ian McAllister, "Orthodox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41, no. 3 (2000): 359-72.
- ㉒ Nathaniel Davis, *A Long Walk to Church: 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Russian Orthodoxy*, 2d e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3).
- ㉓ Sabrina Ramet, *Nihil Obstat: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East-Central Europe and Rus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5-74.
- ㉔ Metropolitan Kirill of Smolensk, "Gospel and Culture", in *Proselytism and Orthodoxy in Russia: The New War for Souls*, ed. John Witte and Michael Bourdeaux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9), 66-76.
- ㉕ VCIOM Survey, March 3-19, 2000. 見www.russiavotes.org。
- ㉖ VCIOM Survey, January 25-28, 2002. 見www.russiavotes.org。
- ㉗ Georgy Bovt, "The Russian Press and Civil Society: Freedom of Speech vs. Freedom of Market", in *Civil Society and the Search for Justice in Russia*, ed. Christopher Marsh and Nikolas Gvosdev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2), 105.
- ㉘ *SSSR i SNG v Rossiiskom Obschestvennom Mnenii* [The USSR and CIS in Russian Public Opinion] (Moscow: ROMIR, 2001), tables 2 and 3 [accessed May 15, 2001] (<http://www.romir.ru>).
- ㉙ John Higley, Judith Kullberg, and Jan Pakulski, "The Persistence of Postcommunist Elites", *Journal of Democracy* 7, no. 2 (1996): 133-47.

馬 什 (Christopher Marsh) 美國貝勒大學 (Baylor University) 政治學系副教授，亞洲研究主任。研究領域主要為東歐、前蘇聯及東亞地區的民主化、公民社會和宗教發展。主要著述有 *Making Russian Democracy Work: Social Cap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2000)、*Russia at the Polls: Voters, Elec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2001)，並合編 *Civil Society and the Search for Justice in Russia* (2002)、*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3)。目前的研究課題包括後共產主義社會中的族群、宗教和國家認同問題。